

苏格拉底“没有底”

——从无知到伦理实践的哲学重构

沈宇琴¹, 李培锋²

¹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²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哲学教研部,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5年11月10日; 录用日期: 2025年12月1日; 发布日期: 2025年12月15日

摘要

苏格拉底的“自知无知”理念是哲学思想中伦理实践与方法论的辩证种子, 标志着从自然哲学向伦理哲学的转向, 它既揭示了人类认知的局限性, 又推动了知识追求的开放性。苏格拉底通过“精神助产术”, 以问答、反诘和归谬等方式引导他人反思逼近真理。然而, 这种启蒙方式引发了个体与城邦秩序的张力, 最终导致他与雅典社会的根本冲突。柏拉图继承其思想, 提出“理想国”; 亚里士多德则批判性继承, 强调德性需通过实践养成。在现代, 苏格拉底的方法论为教育提供了问题导向的教学范式, 也为应对技术时代的伦理困境提供了启示。“没有底”不仅指向苏格拉底对话的未完成性, 更隐喻哲学探索的永恒开放性。

关键词

苏格拉底, 无知, 伦理实践, 辩证法

Socrates' "No Bottom"

—A Philosophical Reconstruction from Ignorance to Ethical Practice

Yuqin Shen¹, Peifeng Li²

¹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²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al Committee,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November 10, 2025; accepted: December 1, 2025; published: December 15, 2025

Abstract

Socrates' concept of "self-knowledge of ignorance" is the dialectical seed of ethical practice and

文章引用: 沈宇琴, 李培锋. 苏格拉底“没有底”——从无知到伦理实践的哲学重构[J]. 哲学进展, 2025, 14(12): 208-215.
DOI: 10.12677/acpp.2025.1412622

methodology in philosophical thought, marking the shift from natural philosophy to ethical philosophy, which not only reveals the limitations of human cognition but also promotes openness in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Through “spiritual midwifery”, Socrates guided others to reflect on and approach the truth through questions and answers, cross-examination, and reductio ad absurdum. However, this approach to enlightenment led to a tension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ity-state order, which ultimately led to a fundamental conflict between him and Athenian society. Plato inherited his ideas and proposed the “Ideal State”, while Aristotle inherited them critically, emphasizing the need for virtues to be cultivated through practice. In modern times, Socrates’ methodology has provided a problem-oriented teaching paradigm for education, as well as a revelation for dealing with the ethical dilemmas of the technological age. The “no bottom” not only points to the unfinished nature of Socrates’ dialogues, but is also a metaphor for the eternal openness of philosophical inquiry. At a time when technology and power are intertwined, his thought is still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Socrates, Ignorance, Ethical Practice, Dialectics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哲学从彼岸的天上拉回到此岸人间的人。其一，他通过“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宣言，将传统的自然哲学命题转向“自我”、“人”[1]，开创性地主张通过内省式心灵探索来理解存在本质，这种从宇宙本体论到人类认识论的转向，不仅标志着古希腊哲学进入了黄金时代，更确立了人本主义哲学的基本范式。其二，在方法论层面，他建构了以“精神助产术”为核心的辩证对话体系，通过概念辨析与逻辑论证的思维训练，既克服了智者学派相对主义的理论困境，又为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确立了“真理即美德”的价值坐标，使哲学真正回归到追求智慧本质的轨道上来。

2. 苏格拉底“无知”的哲学内涵

苏格拉底宣称“无知”的哲学宣言，既非智术师式的怀疑论调，亦非简单的谦逊修辞，而是一场深刻的哲学革命。当古希腊思想困顿于自然哲学的本体论迷雾与智者的语言游戏时，苏格拉底以“无知”为利刃，斩断了传统知识论对确定性答案的执念。

2.1. 从自然哲学到伦理转向

在苏格拉底之前，自然哲学家们主要关注对自然现象的探索，试图用自然本身来解释自然。其中就以泰勒斯为例，他提出“水是万物始基”，这源自于希腊人对海洋的传统崇拜，即海神夫妇是万物的祖先[2]。祖先的意思包含了一种生殖崇拜，古希腊的第一个哲学家还带有生殖崇拜的痕迹，在一定意义上他也是祖先崇拜的最后的阶段，但是，他又是权力意志的第一个阶段，他实际上已经有了摆脱祖先崇拜的倾向[2]。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始基”的命题，其理论基础在于水的无定形特性使其具备转化为万物的可能性，而没有充分考虑到其他可能存在且合理的解释，陷入独断论的局限中。这反映出当时自然哲学家在探索过程中由于认知手段和知识储备的限制，容易陷入独断地认定某一要素为本源的困境。

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认为，整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变化与运动，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永恒存在的、

长久不动的和永不变化的[3]。巴门尼德始终坚信“存在”才是确确实实、毋庸置疑的客体,这与“非存在”是完全相反甚至是相互排斥的关系[3]。所谓“非存在”,就是指不存在,也可以理解为“无”,这确实是与“存在”“大有不同”[3]。巴门尼德一方面否定了非存在的实在性,另一方面他又断言唯有存在具有本体论地位,他将均质、静止的抽象的存在确立为宇宙本体。否认了事物的多元化发展变化,否认了人类感官经验的可靠性,也陷入独断论的局限。同时,又引发了怀疑论的质疑,因为如果巴门尼德的结论是正确且唯一的,那么人类对世界的日常经验和认知都将被推翻,这使得人们对知识的确定性和可获取性产生了怀疑,进而对自然哲学的探索路径产生了迷茫。

苏格拉底针对早期自然哲学的困境,创造性地把自然哲学转向对“自我”“善”“人”的研究,特别是明确提出了要“认识你自己”[4]。强调人类首先要认识自身的局限性和无知状态,这是获取知识和智慧的起点。在苏格拉底看来,人类的理性是有其边界和不完善之处的,承认自己的无知并非一种消极的无能为力,而是一种积极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反思。例如,在他与人的对话中,苏格拉底总是通过提问促使对方意识到自己对一些道德概念、价值观等的认识实际上是模糊和肤浅的,从而引导人们去深入思考这些伦理问题,逐步接近真理。这种将无知作为人类理性根本境遇的观点,促使人们从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角度去探寻知识和美德,开启了哲学探讨的新方向,即更加注重对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挖掘和对伦理价值的追求,而非仅仅执着于自然世界外在的本原和变化规律。

2.2. 无知的双重性

民主派凯瑞丰曾向德尔斐神庙求得神谕:他问是否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祭司回答说,“无人更有智慧”[5]。这与苏格拉底自认无知的表象矛盾。于是苏格拉底通过拜访的政治家、诗人和工匠,观察到那些掌握特定技艺的个体往往错误地将专业领域的有限能力泛化为普遍智慧,这种认知偏差反而阻碍了他们对真正智慧的把握。正是基于这一现象,苏格拉底最终领悟到德尔斐神谕的深层意涵。“无人智慧胜过苏格拉底”的意思并不是说苏格拉底智慧如神,而是说,与神相比较,人类的智慧是微乎其微的,神不过是借用了苏格拉底,让世人明白,人类中“无论何人像苏格拉底那样认识到自己真的在智慧方面一文不值,这个人就是最智慧的”[5]。这句话与德尔斐神庙“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形成哲学呼应。苏格拉底由此揭示,承认人类认知的有限性,恰恰构成了超越常人的智慧起点。

在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中,无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他通过和对话者交谈,以自己的无知身份不断提出疑问。在《游叙弗伦》篇中,苏格拉底通过和认为自己精通敬神事务的神学家游叙弗伦请教“虔敬”,让游叙弗伦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再以坚持认为自己不了解这些事情不断提出追问,令游叙弗伦多次改变自己给出的虔敬定义,最后又回归于传统的虔敬观念之中[6]。这种诘问的过程就像是在剥洋葱,一层一层地剥去对话者(游叙弗伦)虚假知识的外衣。苏格拉底通过“什么是虔敬”的追问,对话者试图以“诸神所珍爱的(prosphiles)是虔敬”作为本质定义时,苏格拉底会指出这一回答的弱点,即不同的神灵会珍爱不同的东西[7]。通过这样的质疑,让对话者原本看似正确的知识,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

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指出属人智慧与神性智慧的差异。他指出,相较于神的完满智慧,人类认知具有根本的局限性。而正是对这种局限性的自觉认知,构成了哲学智慧的基础性特征。苏格拉底称这种智慧是一种“人间的智慧”,这种智慧既区别于那些自称的“有智慧者”的技艺,也区别于神的智慧——唯有神才拥有绝对的智慧,同时也还包括了对神人两种智慧差别的认识[5]。属人智慧是人类凭借自身经验、感觉和有限的知识所构建的智慧体系。这种智慧往往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因为人类的认知能力受到生理和心理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很容易陷入误区。而神性智慧是至高无上的、完整的智慧。它代表着真理的全部和本质。苏格拉底自认的无知就是对人类智慧的清醒认识,他明白人类有限的智慧无法完全接近神性智慧。但这种对无知的承认并不阻碍他对真理的追问,反而促使他更加谦逊地

去探索, 试图在属人智慧的基础上不断接近神性智慧所蕴含的真理。

2.3. 伦理领域的无知悖论

苏格拉底的哲学视野实现了对前苏自然哲学传统的根本性超越, 其关注焦点从物理宇宙转向了由伦理价值、人类存在、善的理念构成的规范性领域。在苏格拉底的思想世界里和实际生活中, 他认为人的灵魂中都是有真理存在的, 某个人之所以会行恶, 是因为他被偏见或者墨守成规给欺骗了, 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个错误的行为会伤害自己的灵魂, 如果他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是好的事、什么是善的事, 他们就肯定不会去做坏的事[4]。其道德哲学的核心目标在于实现“恶向善的转化”, 而这一过程的实现途径在于持续积累德性认知, 通过理性反思和道德教化提升个体的伦理智慧, 从而将知识转化为实践中的善行选择。

从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阐释中可以看出, 该理念在知识论与实践论层面达成辩证统一。其一在知识论层面, 无论是知识还是德性, 二者均以善的理念为认知对象, 且皆源于主体对自身的反思性认识。这种自我认知本身即蕴含着真理性与道德性的双重属性, 从而在认识论层面实现了真与善的辩证统一。其二在实践论层面, 无论是知识还是德性, 苏格拉底强调理论知识必须外化为具体行动, 通过智慧将善的理念转化为现实行为。这一过程要求认知主体保持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内在一致性, 与中国传统哲学“知行合一”的理念形成跨文化呼应, 最终实现德性认知与伦理实践的统一。

阿尔喀比亚德是古希腊雅典的著名政治家, 他是苏格拉底的弟子之一。阿尔喀比亚德作为雅典著名政治家和苏格拉底的门徒, 其政治思想深受苏格拉底伦理学影响。在师从苏格拉底期间, 他接受了系统的美德知识, 并将苏格拉底的道德哲学诠释为一种通过理性自律实现精神统治的实践智慧。阿尔喀比亚德的误解源自于自始至终透过政治的视角看待苏格拉底的哲学, 这导致他未能真正理解苏格拉底试图给他的教育, 从而也未能苏格拉底的影响下变成一个更好的政治家[8]。在面对政治权力和欲望的诱惑时, 他没有运用正确的美德知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最终导致了堕落。

3. 方法论实践: 诘问法的生成与冲突

苏格拉底认为, 作为绝对真理的善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先天理念, 这一终极原则源于一种神秘的力量。然而, 由于主体认知潜能常处于潜在状态, 需要通过辩证启蒙唤醒主体认知潜能, 这构成了苏格拉底诘问法的产生基础, 该方法本质上属于一种辩证法。

3.1. 辩证法作为知识生产的“产婆术”

苏格拉底的教学法之所以被称为“产婆术”, 是因为苏格拉底认为他的母亲是一名助产婆, 他要追随母亲的步伐, 他自己是一名精神上的助产士并且通过对话引导对话者“生产”知识, 而非直接传授真理, 这一过程由讥讽、助产术、归纳和定义四个步骤[9]共同构成知识生成的逻辑框架。“产婆术”的叙述发生于泰阿泰德第一次陷入困惑时, 为了鼓励泰阿泰德, 苏格拉底通过不断追问“什么是知识?”岔开了关于知识讨论的主线, 展开了关于“产婆术”的支线叙事, 且从女神阿尔忒弥斯的安排开始对“产婆术”进行解释, 这使得“产婆术”诞生于青年人的需要与神明的使命这双重背景之中, 也正对应了苏格拉底被控告的两项罪名, 即“败坏青年”与“不敬神”[9], 迫使泰阿泰德修正定义, 逐步逼近真理。

真理的获得永远伴随自我否定的痛苦, 而哲学的本质正是直面这种痛苦的勇气, 在个体认知纠偏方面, 苏格拉底的辩证法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到自己原本知识体系中的错误和不足。在著名的“奴隶男孩论证”中, 苏格拉底通过连续提问, 引导未受教育的奴隶“回忆”几何学真理, 使原本对几何知识一无所知的奴隶逐渐认识到自己之前的错误观念, 并一步步推导出正确的几何结论[10]。通过这种方法, 表明个体可以从自己原有的思维局限中突破出来甚至是纠正对知识的错误理解。理性能力超越阶级与教育差异,

真理的普遍性源于逻辑自洽, 从普遍真理探索出发, 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不仅仅局限于个体知识的纠正, 更是一种对普遍真理的追求方式。在对“美德”的探讨中他通过与不同的人对话, 不断排除那些片面的、错误的观点, 试图找到一个适用于所有情况的普遍的美德定义。诘问法就像在一个充满迷雾的森林中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尝试, 寻找一条通向真理中心的正确道路, 为人类的知识进步和对普遍真理的把握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支持。

3.2. 个体启蒙与城邦秩序的张力

苏格拉底将城邦的衰败归因于道德的沦丧和人性的扭曲, 道德的沦丧的核心又在于人性的异化, 因此他认为必须人性教化、秩序重构以及社会复兴。“如果将我处死, 你们将不会轻易找出另一个像我一样的人, 这个人——打个奇怪的比喻吧——就像一只牛虻, 是神赐予这个城邦的, 而这个城邦就像一匹身材高大、尊贵的马, 由于体形庞大, 所以行动迟缓, 需要我这只牛虻来刺激它。”^[11]苏格拉底指出, 雅典的民主制度虽然赋予了公民广泛的自由和权利, 但也导致了公民对真理和美德的忽视。苏格拉底的诘问法就像牛虻的刺痛, 他试图唤醒公民对知识和美德的追求以及打破他们的自满和偏见。然而, 这种刺痛无疑是痛苦的, 因此苏格拉底的言行也引发了城邦中许多人的反感和敌意。他的启蒙方式虽然有助于个体的认知升华, 但却被城邦视为对社会稳定的威胁, 雅典城邦为了维护自身的秩序和稳定, 必须对苏格拉底这样的“异端”进行压制。

在审判苏格拉底的法庭上, 陪审团的判决并非基于对事实和真理的理性判断, 而是受到控告者煽动情绪的影响, 苏格拉底哲学活动的动机可由其自我阐释, 但其社会效应取决于雅典公众的集体认知与价值判断。动机接受与效果认可可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评价维度, 这一矛盾反映了苏格拉底与雅典社会间存在根本性的认知分歧。苏格拉底认为“未经审视的生命, 未算真正活过”(38a)。他每天审视自己和别人, 认为这是最为有益的事业, 尤其有益于青年, 从而有益于雅典城邦^[12]。而在许多雅典人看来这是在败坏青年和城邦, 这种“多数人暴政”使得真正的知识和美德被忽视, 而无知和偏见却占据上风。

3.3. 政治与伦理的不可调和性

苏格拉底未能获得陪审团对其哲学活动正当性的认可, 其根本原因在于雅典公众与哲人之间关于哲学实践效果的认识存在本质性分歧。分歧最终导致苏格拉底面临两难困境——要么放弃其哲学活动, 要么继续承受道德败坏的指控, 若是他接受放弃其哲学活动, 即可避免死刑的制裁。但苏格拉底在申辩过程中, 明确且坚定地回绝了这一免于死一的条件, 其理由是真理与正义的价值超越了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我认为我不该因为危险而做任何卑鄙的事, 我现在也不后悔做了这样的申辩, 我宁愿这样申辩而死, 也不愿采取其他申辩而活。”^[12]

从法律角度看, 苏格拉底接受了雅典法庭的判决, 服用了毒芹汁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严格遵守了城邦的法律程序, 体现了对法律的尊重和服从。苏格拉底认为, 公民应当遵守城邦的法律, 因为法律是城邦秩序的基石, 是社会得以稳定运行的保障。从哲学殉道的角度看, 苏格拉底凭借自身之死彰显了哲学在他心中所具有的神圣地位, 进而为其自身的虔诚奉上了一份真诚的辩白。“雅典公民们……我要服从神而不是服从你们, 只要我还有口气, 还能动弹, 我决不会放弃哲学, 决不会停止对你们进行劝告, 以我通常的方式向我遇到的你们之中的任何一位指出错误。”(29d)^[12]他的死成为了哲学家为了真理可以牺牲一切的象征, 激励着后世无数哲学家坚持自己的信仰和追求。

福柯在《申辩篇》的读解中, 认为修辞术是权力技术与知识形式, 目的是要控制个体, “在所说的东西与言说所针对的对象之间, 建立起一种约束性的连接、一种权力连接为目标”^[13]; 在当时的政治场域中, 修辞术已然成为主导性的权力运作机制, 它的核心功能在于通过系统的规训手段实现对公民个体的

管控,进而确保社会成员对既定秩序的服从与归顺。我们看到雅典当时的政治伦理主体的典型特征是“忽视自我”。这决定了雅典政治生活的状况,即民主制陷入危机,“不能践行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话语”[13]。对自我的忽视导致公民大会堕入为权力博弈的话语场域,真理价值在政治实践中被系统性遮蔽。从福柯的视角看,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的言说绝非简单的自我辩护。他采用“无知”的反诘修辞,颠覆以智术师和法庭为代表的真理宣称机制;他将自己定位为神派来的“牛虻”,实践着福柯所说的“直言”,即冒生命危险拒斥非正义的政治行为,是为了不丧失自我、忘却自己,力图避免被千人一面的非差异性结构所捕获,沦落为一般“民众”的境地[13];最终,他在面对死亡威胁时的平静与拒绝求饶,更是一种对城邦生命权力的终极解构,通过哲学抉择将死刑场域从权力的惩罚表演,转变为个人哲学信念与主体性的最终完成。鉴于此,苏格拉底规避公共政治场合的言说,转而将哲学实践定位于主体性交往领域,这种哲学实践既在城邦政治范畴之外,又与政治构成复杂张力关系。

4. 思想史影响与当代启示

苏格拉底的“无知”如同投入哲学长河的一枚火种,既点燃了后世的思想炬火,也在燃烧中映照出认知的永恒裂隙,他的追问终结了前苏格拉底时代的自然哲学独白,却开启了更为激烈的哲学对话。从雅典学园到吕克昂学院,从理念世界到经验现实,柏拉图的理念论与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批判,皆是对苏格拉底之问的回应与重构。师徒三代的张力,构成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而这场革命的起点,正是苏格拉底对“无知”的哲学凝视。

4.1.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继承与批判

苏格拉底之死促使柏拉图深刻认识到哲学与政治之间的根本对立,认为公民大众难以被理性说服,无法超越主观意见抵达客观真理。他提出唯有强加真理于民众才能变革雅典民主政治,而这一目标唯有在其理想构建的“哲人王”统治的“理想国”里才有可能实现,以此达成真理对政治的至高统治。在柏拉图看来,所谓真理,就是对永恒不变事物,即理念的探求,而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则是意见的海洋[14]。所谓哲人,就是走出了意见的洞穴,见识到了最高的理念,即善的理念的人[14]。为了承担自己的政治责任,见识到了善之理念的哲人又回到了洞穴,将自己所追寻到的真理或知识宣告给仍居于洞穴之中的同胞[14]。他认为世间万物只是理念世界的模糊摹本,唯有通过内省与思辨探寻理念真谛,哲人凭借对理念的深刻洞察,方能以智慧引领城邦,实现正义与秩序的完美交融。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系统解构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学派“德性即知识”的命题[15]。通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方法论宣言,他揭示出将伦理德性简化为理性认知的局限性。在第二卷第六章,亚里士多德提出德性本质是“通过习惯养成的灵魂的卓越状态”,确立 ethos (习惯)、pathos (情感)与 logos (理性)构成伦理实践的三重维度[15]。在他看来,单靠知识储备是难以铸就美德的,需要个体在生活实践中经由习惯的养成,日复一日地磨炼品行;情感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所以要把握情感的度让其与理性相得益彰,才能真正让美德落地生根并完善伦理体系。

4.2. 现代教育中的苏格拉底方法

苏格拉底创造了以问答为核心的独特教学方法即苏格拉底教学法,该教学模式的本质特征在于其问题导向性。相比传统教学方法,其旨在通过不断的提问,引导学生自己思考、探索和发现真理,而非直接传授知识或提供答案。比如,某研究基于此设计的苏格拉底式问题支架从“认知-元认知”双重维度提供了提示性、指导性、解释性三类支架,能显著提高学生的深度提问能力,有效促进高阶问题序列转换,让学生形成分析创造式、深度理解式、评价创造式三种典型的转换循环,还能引导学生构建基于不

同观点的星型、链式和闭环的问题架构逻辑[16]。

海德格尔用“座架”这一概念指代对自然物的支配性控制模式。在他的哲学视域下,“座架”的支配性模式导致主体与意向对象的关系发生断裂,同时消解了人与自然的本质性关联,使存在者陷入更为根本的遮蔽状态,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遮蔽使得主体丧失了对本真自我的认知与揭示的可能性。海德格尔指出,技术“座架”(Ge-stell)将人类存在简化为可计算的资源,可能使对话沦为预设逻辑的机械互动[17]。然而,技术化对话也存在一些问题,它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哲学追问的开放性。因为技术化的对话往往有一定的预设程序和模式,可能会限制学生的思维范围,使其倾向于寻找符合模型预设答案的思路,而不是像真正的哲学追问那样,能够在更广阔的思维空间中自由探索各种可能性。而且,技术化对话可能缺乏人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感共鸣和价值引导,这在培养学生全面的思辨能力和价值观方面可能会有所欠缺。

4.3. 无知论在当代伦理学中的重构价值

约纳斯在《责任原理》中指出,现代技术的本质矛盾在于其不可预测的全球性后果,例如生态破坏、核威胁和基因技术的潜在风险。他提出,技术的魔力一旦被释放,是人类自身无法掌控的,对人类自身未来的关切将伴随人类对技术的使用,然而技术力量的深远影响,或许远非人类可以预见[18]。当代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可预测性,而传统伦理学(如功利主义或康德的义务论)因局限于“人类中心主义”和“近距离伦理”,无法应对技术文明带来的长远威胁。因此,约纳斯强调人类对技术后果的“必然无知”,认为技术决策必须优先考虑“凶兆预测”,即优先评估灾难性后果而非盲目追求利益,约纳斯对“无知”的承认,要求人类在技术发展中保持审慎,避免因过度自信导致不可逆的生态或伦理灾难。在此背景下,承认无知不仅是伦理责任的基础,更是对抗技术异化的关键,唯有通过限制人类对技术的盲目信任,才能重建技术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苏格拉底式对话以追问真理为核心,通过不断诘问揭露逻辑矛盾、消解权威垄断,将公共讨论从立场对抗转向协作探索,为现代民主审议提供了深刻启示。苏格拉底与对话者的关系不是单向的、确定的,而是双向的、不确定的。在对话的教化意义生成的过程中总体现出一种思考的张力。这一方面是因为对话双方在平等的同时拥有个体差异性,所以对话往往不一定能达成最终的一致,而呈现出意义的开放性[19]。虽然对话未达成最终的一致,但并非没有指向。另一方面是因为对话的最终旨归在于探索最高的善,是一个爱智慧的过程,苏格拉底在对话中呈现出了自己对美善事物的欲求,也引导着他人热爱美善的智慧[19]。

5. 结论: 哲学何以“没有底”?

苏格拉底的“无知论”、“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一无所知”,并非对知识的否定而是对哲学本质的深刻隐喻,哲学探索的本质恰恰在于承认认知的有限性并以此为起点,在永恒的追问中逼近真理的轮廓。苏格拉底的“无知”不是终点,而是哲学得以“没有底”(即无终结答案)的根源,它拒绝将任何结论视为终极真理而是将答案转化为新的问题,将确定性转化为反思的动力。在当今社会,这种“无知”展现出解放性潜能。当算法试图以数据垄断定义“真理”、当技术乌托邦主义宣称“一切皆可计算”时,苏格拉底式的“无知”成为一种抵抗姿态,它质疑技术的“全知”幻觉,揭露算法背后的价值偏见(如性别或种族歧视的数据训练集),并捍卫人类理性中不可被简化的模糊性与可能性。例如面对人工智能的伦理争议时,“无知”提醒我们,若连“人类何为善”都未达成共识,又如何能让代码决定生命的价值?

哲学“没有底”的开放性,恰是民主社会对抗技术异化的精神资源。它要求我们像苏格拉底一样,在技术狂飙中保持“助产士”的清醒,不生产真理而是催生对话;不提供答案而是激活追问。当我们将

“无知”视为自由的起点而非缺陷时, 哲学便从书斋回归街头, 它不再是精英的智力游戏, 而成为每个公民重夺定义未来之权的武器。最终, 哲学的“无底”与民主的“未完成”在此共鸣, 唯有承认真理永远在途中, 我们才能在算法与权力的合谋中, 为人的尊严与多样性留出呼吸的空间。

参考文献

- [1] 叶秀山, 傅乐安. 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 第1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4: 466.
- [2] 邓晓芒. 古希腊罗马哲学讲演录(一)[J].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07(1): 3-20.
- [3] 刘永金. 巴门尼德“存在”范畴刍议[J].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 2017, 30(1): 80-82.
- [4] 郑伟召. 苏格拉底道德哲学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2021.
- [5] 郝春鹏. 介于无知与有知的居间——《申辩》与《会饮》中的苏格拉底[J].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23(4): 94-101, 157.
- [6] 孙良玉. 柏拉图《游叙弗伦》篇中虔敬问题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20.
- [7] Frede, D. (2022) The Holy and the God-Loved: The Dilemma in Plato's Euthyphro. *The Monist*, **105**, 293-308.
<https://doi.org/10.1093/monist/onac001>
- [8] 陈斯一. 哲学教育及其失败:《会饮篇》中阿尔喀比亚德的爱欲讲辞[J].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2): 5-14.
- [9] 刘莉, 刘铁芳. 重申苏格拉底的“产婆术”[J]. 全球教育展望, 2021, 50(9): 46-62.
- [10] 柏拉图, 詹文杰. 美诺篇[J]. 世界哲学, 2023(3): 28-47, 160.
- [11] (古希腊)柏拉图, (古罗马)爱比克泰德, (古罗马)马可·奥勒留. 柏拉图对话录: 申辩篇、克利同篇、斐多篇; 爱比克泰德金言录; 马可·奥勒留沉思录[M]. 张春, 朱亚兰, 译.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4: 43-46.
- [12] 黄启祥. 论苏格拉底申辩中的困难[J]. 现代哲学, 2022(2): 87-95.
- [13] 杜玉生. 作为直言者的苏格拉底——福柯对《申辩篇》的读解与阐发[J]. 外国文学, 2018(5): 148-157.
- [14] 李永刚. 柏拉图《理想国》三种政治模式的争论[J]. 北方论丛, 2024(4): 47-54.
- [15] 高源. 论亚里士多德情感哲学的形成、发展与贡献[J]. 社会科学, 2023(8): 46-55.
- [16] 赵晓伟, 王师晓, 李情, 等. 苏格拉底式问题支架: 促进学生向 AI 大模型提出高质量问题[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25, 37(1): 102-112.
- [17] 王佳斌. 论人工智能技术与人的关系——基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思考[J].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25, 46(2): 11-15.
- [18] 吴迪. 从“现代技术”批判到“未来责任”伦理——汉斯·约纳斯责任伦理学的理论建构[J]. 科学·经济·社会, 2018, 36(4): 25-32.
- [19] 刘艳侠. 以对话行教化: 苏格拉底的育人之道[J]. 贵州社会科学, 2024(7): 108-113.